

■综述

由远及近，省察生活中的种种命题

——《草原》杂志2020年度刊发作品综述 □赵卡



每一本刊物都有它的“性格”。《草原》杂志以其边地气质、先锋倾向和民族风尚在近几年里愈发凸显出了它的独特性。通过阅读其在2020年度所刊发的作品，能够充分感受到这片文学世界的辽阔和丰饶。我尤其注意到，在这一年里，《草原》敞开了自己的胸襟，既刊发了聚焦日常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也有不少充满隐喻性的先锋文本。

小说：多主题变奏，多样艺术探索

2020年度的《草原》，是以李浩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三个飞翔的故事》开头的。在这篇小说中，李浩进行了卡尔维诺式的文体实验，使读者阅读之后既不知所措又难以释怀。拖雷的《厄尔尼诺》讲了一个中年离异男人老马的故事，他虽拙于口舌，但还算得上勇于行动之人，对婚姻怀有恐惧，最终从婚姻生活中退出，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退让。这篇小说里的老马，就是现实中的某一个“我”。于一爽的《无法理解的行为并不简单》是以筷子进书店的荒诞设想开头的，叙事技术火候把控得好，将理想主义者的市式生活用白描的手法呈现出来，语气沮丧但幽默，“筷子”的隐喻也绝佳。陈萨日娜的《一朵芍药一片海》是一篇观照孤独的小说，小说的芍药意象很美，扑面而来的忧伤和幽怨，以复沓的句式写出了一种“辽阔的困境”。文珍的《故人西辞黄鹤楼》写了一个同学聚会的故事，“同学聚会”本是一种俗套的题材，但文珍的叙事针脚细密，眼光犀利，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出了人的无意义的社交困境。浩日沁夫的《为默尔根守灵》是一篇“说”出来的小说，从头至尾没有一行叙述也没有一句描写，作者用娴熟的对话风格架构了一个奇崛的故事空间，使“守灵”也有了非同寻常的象征意味。李文俊的《遥远的敖特儿》和娜仁高娃的《醉驼》都聚焦“存在之孤独”，隐喻人在寻找精神出路时遭遇的诸多困境。

马金莲的《良家妇女》把病房里的无聊耐心地描写了出来。作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她细腻的笔法，显微镜般观察人物的动作表情和内心世界的。海勒根那的《第三条河岸》和《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都是致敬大师的同名之作。这个写作为本身使作品充满了互文性，我们总能从海勒根那的叙述中发现他对“历史的个人化”的反复强调。

调。杨黎的《大一远》写的是在飞机上丢手机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绝不和这个世界有任何妥协的信念。陈鹏的《十一月的右前卫》是一篇硬汉小说，语言凛冽，有先锋气息。渡澜的《油壶人》像极了外国小说，文本里充满了臆想、疯癫、梦呓、讽刺和令人惊奇的句子。

散文：山水抒情和道德纪事的突破

《草原》杂志在散文栏目的设置上颇费心思，所刊发的作品整体上质量比较高。作家们在散文创作中也不断刷新文体意识，收获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

汗漫的《湖口记》看上去是一篇游览之作，实则是在“在石钟山上看湖口”这个角度切入，将地方志里的东西挖掘出来，转化为个人的敏感思考。王族的《食为天》将新疆奇异而丰富的美食写得令人垂涎欲滴，认为这些美食其实传达的是新疆人的豁达生命观。苏华的《红红的嘴唇及其他》读来令人震撼，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涂口红简史，实则关于生命仪式的记忆——接生婆用脐带血给刚出生的婴儿涂嘴唇。瑛宁的《嗜哑的歌者》关注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存境遇，她以毫不夸饰的质朴情怀记述了一个木工厂的匠人们的失落命运。程远的《水井·河套》简洁而丰富，体察了人和水的紧密但亦紧张的关系。周齐林的《栖息之地》聚焦当下中国农村日益严峻的空心化问题。雪小禅的《食鱼帖》《山河帖》《执手帖》里有大禅意，恣意的行文如猛火烧茶般热烈，一口啜下去就会从内心的枯槁早带映出一个措辞华丽的“杜闲”来。何瑞乐的《京漂记》书写一段苍凉的都市漂流生活，但在困境中显示出一份幽默、豁达。李达伟的《面孔》探讨“面孔”的符号意义，并对应现实的种种经验，折射出自己的种种思考。作品语言密度大，像一个人的“语语巷巷”。

散文离生活最近，在文体上是最自由的。散文家应该摒弃散文的传统定义，要闯入新的天地里，敢言“难言之隐”，善睹“熟视无睹之事”，敢行“无路之路”，于有限处知无限。如果我们老是处于一种套路、老思维之中，写出来的作品就会使读者丧失惊奇感。通过阅读《草原》上的散文作品，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在拓展文体可能上所做到的诸多尝试。

诗歌：叙事经验和抒情伦理的重塑

《草原》杂志在诗歌方面开设了颇具影响力的栏目“北中国诗卷”。这个坚持了很久的栏目所展示出来的现代观念、包容精神，依然在今天的《草原》上延续着。

“九三年/我在前门当警察”，这是诗人侯马组诗《九三年》的起句，一个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人物被诗人准确地捕捉到诗歌中，一个那么鲜活、饱满，仿佛就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极具画面感。侯马的诗是那种风格意识强烈且没被文学体制影响的诗，克制而准确，闪烁着质朴的光泽。安琪的《内蒙古》属于系列组诗，刊出的只是寥寥几首，但足以展现出她恣意而不失庄重的抒情魅力。作为内蒙古诗坛的一员宿将，温古的诗一直以准确、拙朴和坚实著称。组诗《余音》展示了他出色的语言掌控能力。樵夫的《星光和盐分》里有时间意识、悲悯意识和清晰的现实感，这得益于他拥有较好的处理现实的能力。衣子的《阴山书》，意象单纯，措辞典雅，气息舒缓，语调沉着，读来如进入一片开阔的地带。叶芝认为现代诗就是“和自我争辩”，我们在胡斐的《大地宁静》中发现一种“与自我争辩”的语言质地。白鹤林的《饮月集》将诗、酒、月融为一体，语调舒缓，很像中国古代人的牧歌式唱酬。蒋立波的《稻草人语录》意象鲜明，语气舒缓，修辞多样，极具美学想象力。七七的组诗《更远的光》里有生气勃勃的活力，有直截了当的措辞。李不嫁的组诗《这人间，暂是我庐》兼具咏物、感怀和劝喻的特点。宋晓杰的《来去之间》在对人、事、物的体察中，体现了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洞穿性力量。韩少君的《北方诗抄》有一个静止的朝向高处的抒情视角。作者面对的是让他有敬畏感的事物，所有的意象都是高度神格化的，噪声要化为静谧，实体和修辞之间充溢着一种庄严氛围。唐力的组诗《岩石之眼》语言精到，空间感强，有些短制中的古典气息令人着迷。

总之，诗人们在主题、形式、修辞、语言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探索。诗贵在呈现、启示和召唤。期待诗人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诗歌的职能，它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别在哪里，并寻找出独属于自己的诗学观念，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

■声音

而立诗学：自我批评、多重视野与诗的新征程

□马骥文(回族)

2020年必定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在这一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中被统称为“90后”的一代人自此也正式迈入“三十而立”的人生阶段。作为这一群体中不论情愿还是不愿意都最先体验这份年龄“时感”的青年诗人，如何看待这一生命时段的意义以及它与个人生活和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以及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曾经历和要经历此年龄的诗歌同行在文字或心灵上都势必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并非时间感伤主义者的我，身处“而立之年”，尽管并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声宣扬的事情，但它却提供了一个使我暂时停顿、整理自我、反思总结的珍贵契机。

“三十而立”出自《论语·为政》，其意宽泛点来说是指人在30岁时，应该要有所成就，可以自立。尽管存在古今历史情境的差异，但将此说法挪用至今日的诗学领域，我认为它也有部分的合理性，即一个诗人跨入30岁，其诗歌的观念、方法、眼界、心智、技艺和写作状态等等都应该开始成熟并且能够自立。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形而言，其中必然包括一些例外状况。

诗歌写作上的自立，首先与“自我批评”意识的确立相关。自我批评不仅意味着一位30岁及以上的诗人要在个人写作中开始保持警醒以及有益于自我修正的态度，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能力对我们所处的诗歌场域、人的境况、社会现实、历史肌理和世界景象做出深邃和宽阔的批判性解释。如果对诗歌写作有更高的抱负和志向，一位在技术层面已经有所心得并且可以自立的青年诗人，到了30岁时就不应该仅止步于此，而应该将自身所不熟悉或与自身针锋相对的事物纳入到自我及其诗歌的写作之中，应该走出“闺阁”，摒弃一些沉溺而不自觉的舒适维度，带着问题在更广阔世界的“冒险”历程中去锤炼诗的心智和技艺。我一直认为，所谓对诗歌“技艺”的更高追求和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不是一项单纯的案头事业，而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世界认知和人类意识等因素紧密相关。当我们只关注单纯的诗歌技艺、诗歌问题，会显示出诗歌意识的单薄，以及自我批评意识的缺乏。然而，在今天的汉语新诗从业者中，大部分人的自我

批评意识是不足或缺乏的，这直接造成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十分不够，也影响到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个诗歌生态的良性循环。

自我批评是一项综合的诗歌能力，它与一位诗人的写作、思考、行动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自我批评不是对自我的反叛，恰恰相反，它是对自我更为有机的忠实，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能力的召唤和练习，诗人才有可能不断完善和修正自我。在中国新诗面临各种问题时，这种能力因其极度缺乏而更显珍贵。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当前的汉语新诗领域大概是属于繁荣时期，可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对诗歌真正有深度的思考却明显匮乏。诗歌及其批评、译介正在日益成为某些庸俗事物的注脚。因此，那些想要逃离温暖巢穴进而“走异路、逃异地”的诗人就需要十足的勇气，因为当一种欠缺自我批评能力的时尚潮流固化成为某种标准和尺度时，其强烈的排斥性和自我封闭的弊病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在今天，重提自我批评不是一种道德修饰，而是对一种方法论的重新强调。它或许对我们自身及所处的诗歌场域具有某种辨伪和矫正的效用。

此外，诗歌的自立也与一种多重视野的形成密切相关。在构成诗人素养的诸多要素中，多重视野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不论在时间纵向和横向的维度上，这种多重视野的培育和养成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诗歌能否进行深入的理解，以及在诗歌写作的道路上可否走得更为深远。在今天这个时代，多重视野不仅要求我们超越自身，将眼界时时投向他者，同时，它也要求我们承认自身本来就具有的多重性实质。当前的诗歌场域，单一的诗歌视角或观念已经很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再被我们奉若圭臬。在对诗歌创作的有益探索中，多重视野

总会因其充分的潜力和未来性为我们带来新的方法和内容。多重视野的主旨，与其说是让我们身处若干诗歌传统的阴影下，倒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思考和理解诗歌的方法。它使我们在面对诸种诗歌文本时，可以窥见并理解其背后的脉络和源流，而不至于从一元化的自身出发做出粗简评判。个人趣味主义者往往由于缺乏这种多重视野的方法而容易陷入肤浅和盲视。真正能够从诗歌文本的表面看到其背后整个时代诗歌诸种症候的深邃目光总是显得稀少，而在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力透纸背的目光。

多重视野与“见一个喜欢的诗人就赶紧模仿”的情形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模仿是让我们写成什么的话，那么，多重视野就是让我们不要写成什么。只有在真正找到自身声音的前提下，多重视野才会在诗人那里成立并且发挥其潜力和作用。它不仅仅会将各种资源拿来作为我们借鉴、参考、化用和援引的对象那么简单，而是让我们从自身中彻底拔出，站立在多重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来写作。在此意义上，已经被固化的诗歌观念会被打破，进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诗歌写作也会迎来不同以往的自由度和创造力。多重视野需要我们在成为一个好的诗人之前，要先成为一个好的阅读者。这里的“好”不是指内容方面，而是从方法层面来说的。在读诗的问题上，没有“懂”和“不懂”这种区分，但却有“会”和“不会”的差异。会读诗的人，不只是以一种方式来读，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读。多重视野的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的写作提供新的方法和角度，而且也会为我们的诗歌阅读提供积极的帮助，使我们在面对各种诗歌文本时不至于非此即彼或简单地一刀切，而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从诗歌的阅读中找到比较高级的文本体验。

在诗歌自立的过程中，自我批评与多重视野其实是紧密相关并且互为前提。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中，坚持继续写诗，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如果我们想要在以后的诗歌新征程中做出更为有益的探索和创造，我个人认为对这两方面进行有意的思考和练习是有必要的。上述看法仅是用来供我自勉的，如果它也在有心人那里产生共勉，那将是一件令人荣幸和愉快的事情。

■创作谈

心灵史·生命志·南北书

——长篇小說《出塞书》创作谈 □梁晓阳

《出塞书》是一部心灵史。既然是史，当然就得有一些故事。书里写了两代人的故事，一代是以吕冰莹、吕冰洁、谢良珍、章泽洲等为代表的父辈，一代是以梁小羊、阿依、章光旭、章光亮、杏花、兰花、柳花等为代表的子辈。这些人都经历了“生活的痛”，都感受到了心灵的煎熬。不同的是，父辈是因为要逃难，从广西奔向新疆，经受物质生活的种种磨难；子辈则为了理想、爱情而不断冲破现实，奔向远方。小说的上部主要写了父辈的流浪史，下部主要写了子辈的心灵史。但在某种意义上，上部的流浪历程实际上也是心灵受难的过程，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心灵史。也就是说，整部书就是书中所有人的心灵史。

小说出来之后，有些评论家说，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像非虚构。我不否认这个观点，因为在写法上，我是循着心灵的指示，想到哪就写到哪，而且全书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章泽洲、吕冰莹就是我的岳父岳母的化身，阿依就是我妻子的化身，吕冰洁就是我妻子妹妹的化身，谢良珍就是我妻子婆婆的化身。至于书里的其他人物，比如章光旭、红花、杏花、兰花、柳花、枣花等，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可以说，大部分的人物和事件都在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循”。

至于主人公梁小羊，读者仅仅从谐音就知道与我有关。但是，这个“我”是经过小说化处理了的，我力图把他写成一个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的人，而不是我自己。但不管怎么处理，“梁小羊”都是我的化身，他在书里经历的一切都能从我的生命中找到，包括从初中就开始有文学理想，喜欢看与塞外有关的武侠小说，订阅新疆的《绿风》诗刊，参加文学函授班，与笔友、新疆姑娘曼丽交往，以及中考、高考失利，大学毕业后娶了来自伊犁的妻子阿依，倾听了阿依父辈流浪新疆的往事，受到极大的心灵震撼。他和阿依多年未育，被乡邻嘲笑，父母郁郁寡欢，父亲积劳成疾早逝。他不喜欢官场，背负文学理想寂寞前行，想通过出塞，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大书，把对父辈苦难的讲述和领悟与自己为理想而奋斗挣扎结合起来，完成一部“心灵史”的创作。

在《出塞书》的上部，我采取当事人口述的手法，让吕冰莹、吕冰洁、谢良珍、章泽洲等人讲述了他们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直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以及国家的惠民富农、西部大开发、美丽乡村建设等重要历史时期的命运变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经在广西拥有相当优越的家世和充裕的童年，但时代变迁的诡谲甚至让他们无以求生，无奈之下只得远赴新疆谋求一线生机。他们都是被历史巨浪裹挟的普通人，如同滚滚波涛中的一片落叶，无力、悲苦、艰难，只能随波逐流。尽管经历了不堪的耻辱、血腥的武斗、彻骨的寒冷、透心的饥饿以及各种各样令人心悸的恐惧和不安，但他们却始终葆有善良、仁爱、坚韧、勇敢等人性中温暖、高尚的底色，即使沉埋于泥土，依然发出金子般的光泽。比如没有工作、生活无着的吕冰莹，面对十多个断粮数日、奄奄一息的湖南逃难者，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准备孕检的钱和不多的粮票救济他们，把好不容易讨来的馒头分给收容站的其他难友。被人打折了腿的章泽洲不记恩怨，不讲报酬，一心一意治病救人。“我”的岳父岳母还将孤苦无依的舅母接到新疆，给她养老送终。岳母和姨妹两人年少时父母下落不明，加之出身问题，倍尝生活的苦难，但在个人婚姻方面，既不被物质利益诱惑，亦不为权势所折服，始终遵从自己内心的情感愿望，这种质朴的持守在保命都不易的年代尤能体现生命的尊严和高贵。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质朴、善良、仁爱，才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获得了新疆朋友真挚的友谊和慷慨的帮助。就这样，广袤的新疆成了这些广西人的“避风港”和“新世界”。在这片神秘、辽远、苍茫的大地上，他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和精神的归宿。

在小说的下部，我叙述了梁小羊、章光旭、章光亮、杏花、兰花、柳花、章婕等年轻一辈的现实生活。阿依、光旭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可谓真正的新疆人。当年，“我”的岳父母等老一辈为现实所迫跑到新疆，如今，年轻一辈为谋求理想生活走出新疆，或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闯荡，或到亲戚提供机会的父辈老家广西发展。他们性格中的“新疆气质”在南方“水土不服”，面对各种摩擦和龃龉，光旭、红花、兰花、柳花最终回到新疆，或在天山脚下的千里沃野耕耘劳作，或在乌鲁木齐商海打拼，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营造自己安稳的幸福。而光亮、莲花则一直坚持一种背水一战的精神，在屡战屡败的情形下依然留在内地奋斗，寻找那不知何时才会有光亮。这些新疆青年的“出塞、回归”或者是“重新出发”，既昭示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谱写了绵延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可以说，我在《出塞书》中竭力刻画了50多年间两代人不甘沉沦、奋力拼搏、不懈追求的“生命志”。

有评论家说，我没有因为抒发“诗与远方”就在书中将新疆伊犁描写成一个“乌托邦”。是的，伊犁在我的心中，她是具体的、温情的、实实在在的，比如我在书中写到，因为“我”的岳母没有户口，被遣返，途中逃难，被一户草原人家收留，并在那里生下了阿依，产床是一块门板，接生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医生。阿依出生后，邻近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人都来祝贺，送来了鸡蛋和粮食，“我”的岳母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女儿在伊犁出生后，“我”开始了一年又一年的出塞，有时候和妻子，更多时候是“我自己”，大多数是坐火车，因为经济拮据，更因为想找到那种出塞的感觉。在15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坐了多少次火车，在新疆记录下亲人老乡在伊犁的工作生活。期间“我”也参加劳动，爬雪山、过草原，逛巴扎、进牧区，和当地的各族人成为朋友，多次酩酊大醉，为这种友好的生活而着迷。

我在描写大西北风土人情时，始终以一种南方心灵来观照，比较这片神奇、广袤的土地，所以书中出现了很多南方与西北生活场景的类比，说得明快点，我既在文体上做了跨界的尝试，也在境界和视野上进行了统揽，力图写出一部我心目中的“南北书”。

《出塞书》是我献给我的岳父岳母和我的父母的书，也是献给我妻子的书。可是我最终把它献给了在苦难、世俗和欲望中仍不忘追求的人。我知道，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有太多和我一样忍受着寂寞和煎熬的同路人，我愿意对他们表达我的理解和尊敬。

第七届清远诗歌节在连山举行

本报讯 近期，以“风情壮瑶，边城军吧”为主题的第七届清远诗歌节在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举行。诗歌节由《诗刊》杂志社、《中华辞赋》杂志社、中国诗歌网、清远市委宣传部、连山县委指导，清远市文联、清远日报社、连山县委宣传部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诗人与数十名清远本土诗人参加，感受壮瑶风情，开展诗歌的创作与研讨。

清远于2014年启动首届诗歌节，至今已举办了七届，诗歌节坚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清远的壮乡瑶寨是产生民族诗歌的热土，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此写下《莫愁歌》《连州腊日观莫徕猗山》等诗歌，秦牧、陈残云、芦荟、韦丘、欧阳翎、韩英、梵杨等当代作家都曾使用他们的诗笔描写过这里的壮瑶风情。近年来，方土地又出现了以唐德亮、唐小桃、李福强等为代表的清远少数民族诗人群。

本届诗歌节举行了“诗歌的民族性与当代性研讨会”。《诗刊》副主编王冰认为，清远具有发展民族诗歌、生态诗歌的先天优势，清远诗人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将民族性、生态性和当代性结合起来，承担起传承文化精髓的使命，感应时代，服务社会。诗人杨克认为，民族诗人在写作时有一个优势，他们母语中的表达习惯，是与汉民族有所不同的，使得诗里边的语言更鲜活。丘树宏、邢建建、卢卫平、向卫国、黄金明等诗人、评论家也纷纷对如何发展清远少数民族诗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诗人们先后来到了云山瑶寨茶联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政岐村以及金子山、皇后山等地进行文学采风创作。（紫 瑛）

